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中日、中印安全困境與台灣安全空間的探討：新安全觀模式實踐與台灣的安全選擇（II）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7-2410-H-004-086-
執行期間：97年08月01日至99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張雅君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9年10月27日

中日、中印安全困境與台灣安全空間的探討：新安全觀模式實踐與台灣的安全選擇（II）

壹、 前言：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計劃主旨是想要瞭解冷戰結束後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不斷改善，也就是中國從新安全觀出發與周邊國家改善關係，中國與日本、印度也在二一世紀後改善關係，雙方安全領域互動明顯有所改善，在這種情況下，台灣應從事何種政策選擇才能使自身獲得最大安全空間，並且把中國可能對我方的安全損害最至最低。在中國長期軍事威脅下，台灣的安全選擇上遵循的是傳統安全典範，選擇之一是強化與美國政治軍事關係，之二是爭取周邊國家的友誼與潛在支持，因而中國與周邊國家對抗愈激烈，與週邊國家對抗的數目愈多，台灣就愈安全，尤其是中國與日本和印度兩個大國呈現安全困境，不可否認確實台灣安全空間更是有利。然而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對日本、印度在緩解安全困境上的新安全觀實踐對台灣安全空間構成何種影響？是否中國新安全觀戰略實踐必然意味對台灣安全之損失？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在安全觀認知上的變化對台灣安全利益評估，以及安全政策選擇具有何種啟示？換言之，台灣應如何看待傳統安全與新安全觀這兩種典範的理論發展與實踐意涵，並且選擇既符合自身安全利益，又符合亞太和平與穩定的安全戰略。

本項研究計劃主要研究途徑之一安全困境形成與緩解理論，二是個案研究，本項計劃選擇從中印與中日安全互動來瞭解宏觀性亞洲安全結構，原因在於台灣是亞太安全結構組成部分，本計劃認為台灣的安全戰略實踐受制於整體亞太安全結構的因素更大於國內因素。本項計劃 I 也對日本與印度國際關係及安全研究學者從事訪談，得出結論是亞洲安全結構仍是安全困境結構，這種結構雖然因為新安全觀而有部分程度緩解，但大國競爭，以及未解決之領土因素卻可能導致安全困境深化。本項計劃研究結果是認為台灣在此種結構僅能採取從新安全觀出發的平衡安全戰略，才能有效確保自身安全空間。

貳、 文獻探討

同本項計劃相關的國內外文獻，首先在探討台灣安全必須面對無可逃避之安全困境方面，學者 Alan Collins 指出亞太安全結構存在國家導引之安全困境 (State-induced Security Dilemma)，這也是安全困境之悲劇，他也特別以台灣問題做為個案，認為兩岸存在了這種不可避免悲劇。然則從 2008 後兩岸之間發展顯示這種悲劇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必須深入理解不同於傳統安全之安全概念與理論模式。國外學者 Helga Haftendorn 對三種安全模式—國家安全、國際安全與世界安全理論的探討可以作為探討安全困境形成及可能緩解的分析架構，國家普遍以國家安全作為遵循模式是導致安全困境緣由，而國家對國際安全與世界安

全模式的認同是又是安全困境得以改良或緩解基礎，更引導冷戰結束後安全概念的變化。在安全困境探討上，體系結構導致安全困境不易消弭的觀點可見 Nicholas Wheeler and Ken Booth 在「The Security Dilemma」，以及 Barry Buzan 在「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中的探討，Robert Jervis 在「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論著中提供了從政治心理學途徑觀察安全困境形成原因，Alan Collins 則在「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一書中從冷戰結束前後美俄安全互動論證為何冷戰結束無法導致安全困境。至於安全困境可以通過安全合作改良可能性則見 Robert Jervis 在「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一文探討。國內學者袁易在「多邊主義與安全困境下之合作」一文也從中美關係發展佐證大國致力於安全困境的緩解。

在冷戰結束後安全思維變化方面，冷戰結束前諸多學者如 Paul Walker 為降低核武提出的「共同安全」，Richard Smoke 提出的「相互安全」，以及冷戰結束 Ashton B. Carter, John D. Steinbruner 等人提出的「合作安全」概念與文獻可以提供本項計劃的新安全思維探討的概念基礎。在新安全思維實踐上，Judth Goldstein 和 Robert O. Keohane 的「Ideas and Foreign Policy」，Alexander Wendt 的「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以及 Barry Buzan, Ole Wæver, Jaap De Wilde 共同撰寫的「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提供了本項計劃從建構主義的文化與觀念視角作為思考新安全思維實踐指標的重要文獻。

參、 結果與討論

一、台灣安全戰略三種選擇及其實踐要素

歸納來看，自冷戰開始以來一國在對外關係及安全戰略制訂上大致有三種模式，一是圍堵，二是向大國一邊倒，三是中立與平衡，然而，一國決策者要採取何種戰略才能符合自己安全利益，必須考量多方面因素，包括歷史、傳統、國力、地緣位置等，總的來看，國家戰略實踐往往受制於其所處的安全結構，從現實主義看，結構是權力分配，從建構主義看，結構是觀念分配。質言之，就是安全環境，進一步言之，決策者必須根據其國家所處的結構與環境綜合考量各種要素評估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是所欲選擇戰略之實踐條件，亦即可行性；第二是戰略實踐之正負影響。

21 世紀台灣的安全戰略毋庸置疑是建立在過去幾十年的戰略實踐基礎上，而過去四十年戰略制訂與實踐也受制於由權力分配和觀念分配構築的亞太安全結構，台灣在安全戰略選擇毋庸置疑必須受到這種長期性，歷史性塑造的結構制約，但自 1991 年以來冷戰已結束，最重要的是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長，二一世紀中國崛起已為國際社會承認，中國影響力愈來愈強，這種情勢早已導致亞太地區權力結構發生變化，台灣因此在安全戰略上面對三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與美

國及亞太國家結盟採取圍堵中國的戰略，第二種選擇是採取與中國在政治安全上密切合作的順從戰略，第三種選擇是在美國和中國之間採取平衡戰略。但究竟那一種符合台灣最大安全利益，顯然就必須正確認知當前亞太安全結構，包括大國權力分配，觀念的影響與制約，從而在此前提下評估考量任何一種戰略實踐之可行性，以及正負影響，才能確保自身安全空間。

第一種選擇：圍堵戰略

從結構看，台灣實施圍堵戰略的必要前提是國際體系結構處於高度緊繃對峙狀態，從觀念上看，在高度緊張體系下，各國對安全理念是從傳統軍事安全理念出發。對台灣而言，實踐圍堵戰略最佳條件是全球性國際體系處於高度對峙緊張，如五〇、六〇年代美國與蘇聯處於兩極對峙，台灣在韓戰爆發後被美國認為具有重要戰略價值而把台灣視為戰略盟友，換言之，由於全球體系呈現緊張，美國和蘇聯處於高度安全困境結構下，台灣成為圍堵共產陣營重要的棋子，而台灣也認為加入圍堵中共陣營有利於自身安全利益。次佳狀態全球體系緊繃固然緩解，但若干地區仍然呈現緊張與對峙，例如，中共與美國固然在七〇年代關係獲得改善，甚至在一九七九年正式建交，但中共與前蘇聯卻在亞太地區呈現高度對峙，前蘇聯拉攏越南和印度作為盟友，與中共對抗，在這種情況下，亞太地區仍處於相對性安全困境結構下，台灣仍可以實施對中共圍堵戰略，台灣可以選擇加入蘇聯陣營，然則，國內統治者基於反共與民主價值，加以美國仍需要台灣作為非正式盟友，因而台灣願意降格留在西方陣營，繼續實踐圍堵中共安全戰略。

第二項戰略：向中國一邊倒

從結構上看，台灣實施此項戰略的前提是亞太安全結構對峙完全緩解，在此種狀態下，中國與印度、日本，以及其他亞太國家之領土與主權紛爭完全解決，亞太地區不再存在國家利益引導之安全困境，從觀念上看，軍事因素持續淡化，新安全觀理念成為亞太各國普世遵奉之理念，海洋與能源利益有完整機制與制度處理，最佳發展是亞太地區經濟與政治加速整合，國與國邊界進一步模糊，由結構導致的亞太安全困境進一步緩解，甚至出現亞太安全共同體理想境界，如歐洲同盟般的發展。在此同時，中美關係大幅改善，美國樂見亞太共同體發展，以及中國真正和平崛起。在此種發展下，台灣在安全戰略上勢必需以亞太區域內最大成員中國合作，以謀取台灣安全空間。

第三項戰略：中立與平衡戰略

從結構上看，如果國際體系中的安全困境無法消除，尤其是在地區成員之間仍然存在由國家利益引導之安全困境狀態，從歷史看，平衡戰略是國家往往確保自身存在與最大安全利益之戰略。就亞太地區而言，冷戰結束後迄今，美國一直未放棄在亞太軍事存在，朝鮮半島仍然持續緊張對峙，中國雖然崛起，但與印度、日本大國利益紛爭並未解決，且有擴大態勢。從觀念上看，亞太各國仍奉行傳統安全觀，仍然重視軍事因素，不過在此同時，東亞地區經貿發展蓬勃，經濟整合加速，東協加一已然啟動，各國都必須加強合作來確保自身利益，非傳統安全日益獲得各國重視，這也說明不論從結構或觀念來看，亞太地區呈現相當大不確定

因素，這種不確定性提供了平衡或中立戰略選擇的實踐空間。

二、21 世紀台灣三項戰略選擇可行性評估

從中日、中印安全困境與新安全觀模式實踐成效（見 98 年國科會研究成果報告）的研究可以瞭解，對當前台灣面對的內外環境而言，向中國一邊倒，以及圍堵中共之安全戰略都不具可行性。

（一）圍堵戰略實踐不具可行性原因

主要現實因素是自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共黨非但未步上蘇聯東歐垮台後塵，反而因為改革開放深化而日益崛起，西方原本期望中國在經濟發展後引導政治民主化的發展也未實現，中國共黨牢固的統治中國也造就了中國政治穩定，進而促使中國在進入二一世紀後快速崛起。基本上，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由於北韓發展核武，南海島嶼紛爭，以及美日安保條約因素而存在仍然存在新冷戰陰影，然則中國由於在九〇年代後推動睦鄰、安鄰、富鄰政策，使得周邊國家從中國獲得愈來愈多經貿利益，儘管當前美國大有再度聯合日本、印度與東南亞國家組織圍堵中共戰略，阻遏中國海權擴張，不過東南亞、印度及日本不可能放棄與中國在許多領域合作。

從新安全觀對中日、中印安全困境影響之研究可以瞭解，固然新安全觀尚無法完全緩解亞太安全困境，但顯然有助於強化中共與日，印兩個大國之合作，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青山認為必須要與中國合作來改變中國對日本向海外派兵，修改和平憲法的刻板認知，並且承認日本是一政治大國。中印關係更是如此，印度學者認為固然必須警戒中國的軍力部署，但必須要與中國強化合作，即便是對中國軍事力量最為敏感的軍方也同意如果不與中國合作，印度安全利益反而更會受損。

總的來看，台灣曾經在冷戰紀元對中國實踐圍堵戰略，然而戰略效益在 1972 年後就已逐步遞減。2008 年台灣曾希望以激化兩岸關係來使美國與亞太國家正視台灣戰略地位，但並未成功，美國和日本、印度、東南亞國家固然因為可能再度結合圍堵中國，但矛盾的是他們希望確保台海地區和平，因此台灣如欲實踐圍堵中國戰略將會被國際視為麻煩製造者，而美日印度東南亞國家也因為必須顧慮中國態度，以及利益考量而不可能將台灣正式納入新圍堵戰略，因為如此將會意味。換言之，未來亞太地區結構出現的權力競爭，是非零和式的，不同於冷戰時代的零和競爭，亞太安全困境不易螺旋升高為大規模區域衝突。

（二）向中國一邊倒不具可行性原因

從中國與日本，印度的安全互動與利益爭執可以瞭解，新安全觀固然對緩解亞太安全困境結構具有正面助益，但 21 世紀的發展可以驗證學者指出安全困境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的假設。從訪談日本學者心得可以瞭解，日本雖然一直希望以回歸亞洲戰略來強化對亞太影響力，不過一直難以擺脫美日安保同盟的結構性制約，日本學者青山教授和天兒慧教授認為理論上日本應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保持平衡，但在實踐上日本一直不擅於操作權力平衡的戰略。而日本華人教授協會會長朱建榮認為日本外交模式一旦形成就不易改變，戰後以後日本的傳統外交運作始

終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中美對抗，二是日美安保，雖然日本想要調整，但由於對中國威脅的誇大，因此調整始終未成功。原本日本民主黨上台後鳩山首相再度希望落實平衡戰略，然而，鳩山、小澤去職，日中釣魚台紛爭，以及美國宣示在東亞具有重要利益導致日本再度走向親美戰略。2010 釣魚台紛爭擴大顯示日中安全困境由於領土紛爭而深化，也映證了國家利益引導的安全困境最不易化解的理論。同樣的，印度固然不認為印中之間存在嚴重安全困境，但雙方遲遲未解決邊界紛爭，加以印度軍方關注中國軍力擴張，尤其是海權擴展，毋庸置疑顯示雙方仍然存在安全困境。東南亞國家固然因為與中共經濟整合的利益而必須與中共強化合作，但東南亞國家同樣普遍憂心中國力量日趨壯大可能控制南海，因此企圖與美國強化關係來遏制中國力量，這也導致東亞共同體願景不易在短期內落實。總的看，美國在東亞仍將扮演重要角色，此對中國影響力發展構成制約。

上述情況使得台灣在 ECFA 簽署後，在政治與安全層面不易與中國發展更緊密關係，因為在新圍堵形勢下，台灣戰略地位再度具有重要性，台灣在安全與政治上如果向中國一邊倒，將使中國在亞太戰略和海權發展上獲得突破口，有助於中共將影響力延伸至第二島鏈，此將對美日構成威脅，因此美日和周邊國家絕不允許，同時台灣內部政治形勢也不允許。

三、台灣平衡戰略實踐：新安全觀之作用

從以上探討可知，二一世紀台灣在實踐圍堵戰略和向中國一邊倒戰略都不具可行性，因此台灣唯一可選擇的戰略就是保持平衡戰略。平衡戰略有多種內涵與取向，本人將之分類傳統安全觀下的平衡戰略與新安全觀下的平衡戰略。基本上，台灣只能選擇新安全觀下的平衡戰略。

傳統安全觀下的平衡戰略具有悠久的歷史，早期是英國對歐陸國家採取的戰略，即讓自身保持不偏不倚的角色來獲取最大安全利益，不過平衡戰略操作需要有多方面條件才能成功。與平衡戰略相關的是制衡戰略與結盟戰略，為平衡甲國過於強大所造成的威脅，國家可以選擇與相對弱勢的乙國結盟，以制衡甲國。換言之，操作傳統安全觀下的平衡戰略，操作行動者必須擁有重要資源。平衡戰略是否有助於和平和國際體系穩定一直是國際關係學者高度爭議的問題，從歐洲國際關係發展歷史可以佐證，平衡戰略最終往往爆發戰爭，國家最終也無法保持平衡地位。然則，新現實主義者認為平衡戰略有助於國際體系穩定，二次大戰迄今美國更擅於運用平衡戰略，聯中制蘇就是一成功之平衡戰略，固然其後蘇聯解體，不過從七、八〇年代發展可以瞭解聯中制蘇一度刺激蘇聯進一步擴張，從而造成國際體系之高度緊張。

從上可以瞭解，平衡戰略的操作需要多方面條件和技巧才能成功，台灣擁有重要戰略地位，但台灣由於國際處境艱難，沒有正式身份，因此長期以來在戰略上沒有主動權，然則台灣因為距離中國近的战略地位卻重要成為美國平衡中國力量的重要棋子，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基於「台灣關係法」，美國仍必須對台軍售，換言之，台美之間仍隱約存在非正式結盟關係，這也往往升高台海之間緊張關係，但國民黨在二〇〇八年重新執政後，在強調「九二共識」前提下，

與中國迅速改善關係，這也首次顯示台灣在戰略上化被動為主動，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採取平衡，ECFA 簽署更具有安全戰略意義。

然而，台灣要長期維繫一方面與中國改善關係，一方面與美國維持非正式結盟之平衡關係是相當艱困的，主要是傳統安全觀下平衡戰略過於重視力量對比，此往往與圍堵戰略之間不易區隔，平衡目的最終往往轉變為圍堵，以致導致體系緊張。台灣如果長期維持與美國非正式結盟關係可能會讓中共憂心台灣平衡戰略實質上是圍堵中國戰略，尤其是在當前美國極欲聯合東亞國家制衡中國的情境下。同樣的，美國及亞太國家也將憂心 ECFA 簽署後台灣與中國可能會與中國發展進一步關係，從而對美國及亞太國家利益有所顯豁。

從這裡可知，台灣僅有平衡戰略唯一選擇，但操作相當不易，基於此，為擺脫這種困境，台灣在安全觀上必須從事轉變，也就是應以新安全觀來替代傳統安全觀，首先，台灣平衡戰略應以和平為目的，台灣在平衡戰略不但應以保持台海和平與航行自由為目的，台灣更應提出促進整個亞太安全，尤其是促進海洋和平利用的論述與戰略，換言之，台灣平衡戰略應淡化軍事作用因素，台灣軍事力量應以因應台灣天然災害為目的，向美國採購武器不宜大量而具攻擊性，必須是象徵性。其次，台灣應與中國在非傳統安全多項領域加強合作，例如加強天然災害共同防治、打擊犯罪、糧食、能源…密切合作，建立機制，此一合作宜採開放式，可以邀請第三者合作，讓兩岸雙邊合作成為多邊合作，或者是在與中國強化非傳統安全合作同時，與其他國家同步強化合作，在合作過程與機制建立過程中，能夠增信釋疑。

進一步言之，台灣與中國原本存在深刻由於領土主權導致安全困境，二〇〇八年後台灣與中國主動以九二共識化解台海困境，降低台海緊張，然而，兩岸領導者必然繼續以新安全觀緩解台海安全困境，因為台海主權領土導致安全困境僅僅是暫時緩解，而未根本緩解，如同中印、中日領土紛爭大有死灰復燃，以致導致亞太安全困境大有深化之勢，兩岸安全困境同樣如此。台灣小，資源有限，如果沒有新安全理念的認知，與實踐意志，在當前亞太安全困境有深化趨勢，以及國內政治對立情況下，台灣極易再度陷入亞太安全困境結構中。

97 年國科會研究計劃—赴印度進行訪談研究心得報告

報告撰寫人：張雅君

壹、訪談行程

為深入理解印度安全政策，以及九〇年代以來新安全觀論述對印度的影響，從而能驗證中國和印度之間安全困境存在程度，本人於 99 年 7 月 24 日至 28 日前往印度首府德里相關智庫從事訪談研究，訪談單位和人員如下：

一、7 月 25 日 AM. 10~12，拜訪尼赫魯大學教授 Swaran Singh, B. R. Deepak，與之討論，並提問。

二、7 月 26 日 PM. 2~3:50，拜訪印度聯兵協會(United Service Institute of India) Brigadier Vinod Anand 准將 Swaran Singh，與之討論，並聆聽 Dewan 就印度海洋政策及挑戰提出之簡報。

三、7 月 26 日 PM. 4-6，拜訪國防研析中心(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本人先就研究主題做 20 分鐘簡報，以及提問，完畢後從事討論，參與討論人員包括：Rajaram Panda 研究員，Jagannath P. Panda 副研究員，Namrata Goswami 副研究員，Smita Purushottam 研究員。

四、7 月 27 日 AM. 10~12，拜訪印度觀察者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資深研究人員 P. K. Ghosh, Rajeswari P. Rajagopalan 博士，與之討論並提問。

貳、訪談觀察

一、印度智庫相當多，軍方智庫不少，筆者訪問之 USI 與 IDSA 屬於軍方與安全智庫，因此他們發言較為審慎，對中國認知也較負面，但學界與非軍方智庫看法持平與中立，考量的是印度全方面利益，ORF 尤其注重非傳統安全議題。但總體言，由於 1962 年中印戰爭、巴基斯坦、中國崛起太快，體制與價值因素，加上邊界問題遲遲未解決，印度上下對中國印象並不正面，不過又不如日本內部對中國認知來的激進，也不如日本內部對中共認知來的兩極，主要是印中之間在經貿領域的互動沒有日中之間來的密切。

二、印度包括軍方智庫在內出版不少與區域研究相關之期刊，印度研究人員著述豐富，對理論和現實分析相當深刻，重視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與西方學界交流密切，因此研究方法受美國影響甚深，不似日本學界不重視理論，較重視資料、情報與實務。比較國際關係三大學派，印度學者較肯定新現實主義。

三、印度對兩岸關係發展沒有日本來的敏感，易言之，兩岸關係對印度而言不似日本那樣具有敏感性與易脆性，但印度對兩岸軍力平衡具有高度興趣，也樂於與台灣強化包括安全領域之交流。

參、訪談研究心得

一、中國和印度仍然存在安全困境

如同亞洲大部分國家一樣，印度認為國家安全面對相當多敏感性和易脆性因素，從受訪者對以下五個指標性議題，包括印度對中共角色認知、印度對中共國防與軍事戰略取向認知、巴基斯坦因素、海權因素、新安全觀作用之觀點，可以驗證中國和印度至今仍然存在安全困境：

1. 中共角色認知：中共對印度國家安全是否具有威脅，印度各界具有不同認知，尼赫魯大學教授 Swaran Singh, B. R. Deepak，以及 ORF 智庫研究員 P. K. Ghosh 固然認為必須重視中國軍事現代化發展，但並不認為中國對印度安全構成嚴重威脅，Swaran Singh 也不認為華爾滋結構現實主義適用於中國和印度之間，他認為中國對印度而言最多只是競爭者，或是挑戰者，但並非威脅者。然而，印度軍事單位較大幅度較嚴重看待中共經濟發展下軍事力量大幅提升對印度構成的威脅，USI 和 ADSI 大部分成員都相當重視九〇年代以來中共國防預算成長，海空軍備發展，以及資訊戰、網路戰的提升，他們認為這些發展固然不全然係以印度為假想敵，但印度國家安全事實上已面對中共軍事力量不斷強化之威脅，尤其是中共具有能力將採購國外武器拆卸後重新研發，將之販售給巴基斯坦，這對印度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固然印度各界，各部門對中共是否威脅者具有不同認知，但總的看，印度相當重視中國軍事方面的一舉一動，以及對印度國家安全及未來發展影響，質言之，整體印度並不會從正面和善意角度看待中國之發展，尤其在軍事層面，這也顯示中印存在了結構性安全困境。

2. 中共國防與軍事戰略認知。中共一直宣稱其奉行防禦性軍事戰略，但 USI 和 IDSA 安全戰略專家認為中共口頭強調和平崛起，但實際奉行的是攻勢性國防和軍事戰略，例證除高額國防預算，武器裝備發展外，更包括 2006 年青藏鐵路通車，以及 2009 年中共成功發射獵殺衛星的導彈，由於中印之間邊界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印度軍事因此更高度關注中共修建青藏鐵路的意圖，蓋因青藏鐵路有助於提高中國的軍事機動及後勤供給能力，可以更方便向西藏及中印邊界運送大量物資，更可以在一個月內運送多達 12 個陸軍步兵師。USI 與 IDSA 強調必須重視中共意圖，而印度一直奉行防禦性安全戰略，印度之所以自 2009 年起在中印邊界增派兩個山地師部隊，主要就為因應中共在西藏大力修建交通設施的軍事威脅意圖。，

3. 巴基斯坦因素。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世仇，儘管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基於反恐而與巴基斯坦改善關係，連帶的也影響印度對巴基斯坦的認知，但印度仍視巴基斯坦為對印度之主要安全威脅，例如，入境印度之巴基斯坦人必須每天向印度地方當局報備。Swaran Singh 明白向筆者解釋，印度與中共之間原本並不存在安全困境，但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嚴重安全困境，而中共長年支持巴基斯坦，這也似乎導致印中之間存在安全困境，易言之，中共如果不堅定支持巴基斯坦，則印度和中共並不存在安全困境。然則，眾所週知，巴基斯坦是中共堅定盟友，中共不可能放棄巴基斯坦，這也導致印中之間存在安全困境。

4. 海洋因素：不論對中共角色持溫和認知，或是負面認知，都愈來愈關注中

共日益積極的海洋活動，及其相應海洋戰略。原因之一在於印度高度重視海上利益，從代表印度軍方觀點的 Dewan 上校簡報可知，印度對於關係印度利益的海洋生命線的認知範圍相當廣泛，為更好執行其東望政策，印度更高度關注日益升高南海爭執，因此對於中共自去年起派兵至亞丁灣行動相當敏感，Swaran Singh 教授，以及 IDSA 研究人員都認為儘管目前中印之間似乎由於邊界問題無法解決而在中印邊境不時呈現緊張形勢，不過從未來角度，基於能源、貿易需求，崛起中共勢必要強化海洋勢力範圍，否則不足以因應其崛起態勢，這種發展很可能導致雙方未來在海洋利益呈現重疊形勢，從而影響雙方安全關係，儘管這是未來性的，但顯然增添了雙方安全困境結構。

5. 新安全觀因素：印度專家和學者都認同冷戰結束以來新安全理念，他們認為此符合印度傳統和平主義，符合五〇年代萬隆會議之和平共處五原則（即所謂潘查希拉），他們也認為印度面對相當多非傳統安全問題，例如糧食、貧窮、水資源、氣候變遷問題的挑戰，這些都必須通過全球合作來解決，尤其是強化與中國合作，印度也希望中國力行和平崛起戰略，同意中國提出之和諧世界理論，不過，印度從中國實際行為，尤其是在軍事層面之發展，對中國和平崛起和和諧世界論述抱持質疑態度，Swaran Singh 認為國際關係建構主義，以及安全共同體之建構是一種理想主義，有可能在未來實現，但並不符合印度目前面對之國際環境。ORF 兩位研究人員就經濟與政治相互關係詢問本人，他們對此一問題有不同認知，P. K. Ghosh 認為印度必須加強與崛起中國經貿合作關係，雙方相互依賴緊密後，彼此在政治與安全層面關係也將改善，現有領土與安全爭執不至於影響雙邊結構性互賴關係，但 Rajeswari P. Rajagopalan 博士則持相反看法，她認為在全球化發展下，雙方勢必須要強化經貿合作，但雙方在政治與安全層面爭執不會因此降低或有所妥協。總的看來，印度專家與學者認為新安全理念確實有助於中印合作關係強化，也有助於降低雙方之安全緊張，但效用有其侷限性，仍必須視雙方具體戰略實踐而定。

二、安全困境緩解

雖然從印度專家觀點得知印度和中國之間仍然存在結構性安全困境，軍事性對峙也隱然呈現，但不致於形成螺旋升高形勢，換言之，印度和中國之間安全困境仍然可以緩解，其因如下：

一、印度不同部門之間對中共認知有差異，如前所述，印度軍方對中國軍事行動最為敏感，印度輿論與若干國會議員也常常推波助瀾，強化了印度之民族主義，不過從與大部分智庫學者訪談可以理解，印度是民主國家，也是和平主義遵奉者，理性主義也將主導印度中國決策，易言之，印度對中國戰略將考量國家整體利益。從與 USI 和 IDSA 人員對話可以理解，即便是強硬軍方，也體認在相當多領域，如果不與中國合作，印度利益必然受損。

二、固然印度視中國為競爭者與挑戰者，但對於美印聯盟，或美印日聯盟的圍堵中國戰略持審慎冷淡態度，一則如印度專家所言，中國是印度重要鄰國，雙

方必須密切合作，印度更必須考量中巴關係因素。二則印度與俄羅斯關係密切，中俄也有戰略夥伴關係，印度與美國密切結合不利於俄羅斯戰略利益。三則印度與中國在國際身份上同屬於發展中國家，雙方在國際政經秩序相當多領域具有共同認知與共同利益。這種發展中國家身份使得印度在對外戰略上具有相當程度自主性，尤其是在與美國及西方世界關係發展上。因此，固然印度樂於與美國強化戰略關係來強化自身安全與經濟利益，但對於美國倡議圍堵中國戰略則持審慎態度，基本上，對於當前東亞呈現新冷戰氛圍，印度抱持密切關注與作壁上觀的態度，但尚不樂意加入，主要不願受制於美國。

無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張雅君		計畫編號：97-2410-H-004-086-				計畫名稱：中日、中印安全困境與台灣安全空間的探討：新安全觀模式實踐與台灣的安全選擇（II）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2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其他成果</p> <p>(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無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發展加速，歐盟整合成功，然而亞太地區由於朝鮮半島和台灣問題未解決，使得亞太地區呈現新冷戰陰影，但吊詭的是，亞太地區經貿蓬勃發展，中國不斷強調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更願意加入東協整合，與周邊分享經濟發展利益，在安全上，中國也順應冷戰結束以來理念，提出新安全觀，但亞太安全結構變化的本質為何，一直被學界爭論，中國究竟威脅者、和平者，或挑戰者，更是一個爭論，也使得各國戰略決策往往陷入矛盾狀態。本項計劃從中國與日本、印度安全互動來檢證安全困境不易根本消除，學術意義在於進一步釐清學界對亞太安全結構的認知。同時由於台灣是亞太安全結構的一個重要部分，此項計劃有助於進一步提供台灣決策者在計算何種戰略有利於台灣安全空間與安全利益一個重要參考。